

【区域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专题】

空间现代化：分析框架、基本诉求和路径优化*

孙久文 吴殿廷 赵西君

摘要：空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场所与基础，同时也是宝贵的综合资源。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与独特语境下，空间现代化超越了单纯的物理环境改造，成为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人民幸福安康的核心议题。从“载体空间”与“资源空间”双维度构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空间发展的内在规定性。通过梳理空间现代化理论谱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耦合性，深入剖析“载体空间”与“资源空间”双维视角下的基本诉求，在此基础上指出双维视角下中国空间发展的困境和问题。研究提出，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的顶层设计优化、以科技创新与数字治理为驱动的智慧赋能、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的治理能力提升及以文化自信为根基的空间特色塑造四个方面将是中国式空间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空间现代化；载体空间；资源空间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3-0005-10 **收稿日期：**2026-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24BJY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久文，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8)。

吴殿廷，男，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赵西君，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通信作者(北京 100190)。

一、引言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方位、深层次变迁过程。空间作为这一过程的物质载体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其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即空间现代化——构成了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维度。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历经的路径，往往伴随着对空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城乡区域的严重对立、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以及社会空间的高度分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 2022)，必然要求一条与之相适应的空间发展新路。

当前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对空间问题的探讨，或侧重物理实体的规划建设(如城市规划、区域发展)，或聚焦自然资源的管理配置(如土地政策、生态保护)。然而，将空间仅仅视为被动的“容器”(Container)或纯粹的“资源”(Resource)均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空间作为载体，其基础设施网络、功能布局、形态风貌直接决定了经济社会活动的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空间本身又是有限的、有价值的、可被配置的“战略资源”，比如深海与深空已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其分配与利用方式深刻影响着国家发展、社会公平、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空间现代化，本质上是“载体空间”现代化与“资源空间”现代化的辩证统一过程：前者是后者的物质体现，后者是前者的价值内核。

二、空间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

空间现代化理论并非单一的理论,而是源于对现代化进程中空间维度深刻反思的一系列思想的集合。它突破了将空间视为静止、中性背景板的传统观点,强调空间本身是社会生产的动态过程与结果。

1. 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源流

亨利·列斐伏尔在其经典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Lefebvre, 1991)。”他认为,空间并非被动容纳社会的容器,而是通过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权力与阶级关系,被主动生产出来的。每一个社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大卫·哈维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资本如何通过“空间修复”(Spatial Fix),即通过投资建成环境、开拓新市场等手段,化解其内在的积累危机,但这往往导致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Harvey, 2006)。爱德华·苏贾提出“第三空间”理论,打破了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二元对立,强调空间的复杂性、多元性与能动性,为理解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Soja, 1996)。曼纽尔·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理论则聚焦信息时代下,空间形态随资本、信息、技术的流动而发生的深刻变革,指出流动空间已成为主导当代全球化进程的空间形态(Castells, 1996)。这些批判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空间生产的矛盾性,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景观,也导致了空间异化、剥夺性积累与生态危机。

2.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空间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为规避西方空间生产模式的弊端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五大核心特征对空间现代化提出了明确的内在要求。

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我国空间发展必须立足超大规模人口基数,具备宏大战略视野与超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我国空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都会因人口规模效应被显著放大,这不仅关乎区域协调发展,更涉及民生保障、资源分配、公共服务供给等系统性问题。因此,在空间布局中,需充分考量人口分布与流动规律,兼顾城市集聚效应与乡村振兴需求,合理配置产业、交通、公共服务等空间资

源,同时,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有效防范人口过度集中或分布失衡引发的资源短缺、环境压力、社会治理等系统性风险,确保空间发展既要支撑人口规模需求又要考虑可持续性。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落实到空间发展,核心是让空间资源配置充分体现公平正义。中国式空间现代化要求在空间规划中,既要统筹城乡空间布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推动城镇优质资源向乡村延伸,又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倾斜,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同时,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合理布局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让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都能公平享有发展成果,防止因空间资源分配不公而加剧贫富差距,确保空间发展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空间发展中体现为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也要守护历史文脉、塑造精神家园。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部分地区出现“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困境,盲目追求高楼大厦与现代化表象,忽视了地域文化特色与历史遗产保护,导致文化沙漠化现象。中国式空间现代化需坚持“形神兼备”,在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居住环境、提升产业支撑等物质层面建设的同时,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加强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遗文化等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将文化元素融入空间规划与建设全过程。通过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乡村肌理,构建兼具物质舒适度与精神归属感的空间环境,避免同质化发展,让空间成为传承文化、凝聚精神的重要载体,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特征,决定了我国空间现代化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空间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各环节,实现空间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空间发展中,必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构建科学合理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推动空间开发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发展绿色产业,减少空间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加强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服务功能。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空间发展全过程,避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发展,推动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发展格局。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特征,要求我国空间

格局优化必须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空间关系。在国内层面,空间发展需立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优化区域分工协作,完善交通物流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国内空间循环体系,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安全性。在国际层面,摒弃传统发展模式中通过对外扩张、殖民掠夺获取空间资源的做法,坚持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合作解决领土、领海争议问题,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加强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开放包容的空间合作体系。

三、空间现代化的“载体—资源”双维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空间现代化,关键要实现“空间载体”与“空间资源”双重属性上的可持续与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构建一个安全

韧性、互联互通、功能完备的物理空间支撑体系,更要实现对国土空间这一稀缺资源的公平、高效、绿色和可持续的配置与利用,即实现载体现代化和资源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任何将二者割裂开来的认知与实践,都无法真正把握中国式空间现代化的深刻内涵。这里重点从“载体—资源”双维框架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空间现代化(见表1、表2)。

1.载体空间和资源空间内涵分析

载体空间(Carrier/Container Space)主要指空间作为人类活动发生的物理场所和基础平台所具有的属性。其现代化核心是“功能的优化”,关注点在于空间系统的结构、效率、连通性与安全性。具体包括:以城镇体系为代表的国土空间格局、基础设施网络、建筑环境与场所营造、防灾减灾设施等。载体空间的现代化追求形成一个安全韧性、协调均衡、集约高效的物理支撑体系。资源空间(Resource Space)主要指空间本身作为一种稀缺、具有价值且可被配置的战略资产所具有的属性,其现代化核心是“价值的实现”,关注

表1 载体空间维度的中国式空间现代化特征要求

载体空间维度	空间现代化的特征要求
安全韧性	现代化空间载体需兼具应对内外冲击的韧性与基本安全保障能力。要构建稳固国土安全格局,筑牢国防边防防线;强化防灾减灾设防,推进灾害防护与应急设施建设;优化公共卫生空间布局,完善“平急两用”设施;保障水、电、气、交通、通信等城市生命线系统稳定运行,构建多路径弹性供应网络,全面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协调均衡	区域协调发展需深化四大区域战略,依托“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部署,构建跨区域联动的载体空间结构。城乡融合发展要打破二元壁垒,推动要素双向流动,强化设施互联互通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现代城市与美丽乡村,形成工农互促、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集约高效	空间高效利用需践行紧凑城市与精明增长理念,以TOD模式推动土地混合利用、严控开发边界,优化存量空间。同时,加快建设综合交通、新型能源、5G/6G等现代化基础设施,提升空间智慧运行效能;通过城市更新与存量盘活,对低效空间进行改造活化,深圳“工改工(旧工业区化的改造)”“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可为实践提供借鉴,全面提升空间利用效率与品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2 资源空间维度的中国式空间现代化特征要求

资源空间维度	空间现代化的特征要求
公平配置	公平配置是空间正义核心,需保障区域与群体发展权。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调节区域差距,维护农民权益,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彰显共同富裕导向
绿色可持续	绿色可持续是空间永续利用基石,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与有偿使用制度,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文化赓续	文化赓续是空间精神塑造关键,需系统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乡风貌特色塑造,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增强国民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
集约高效	集约高效追求资源效能极致,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落实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推动土地利用从粗放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点在于空间资源的分配、效率、可持续性与公平性。具体包括:土地资源的供给与配置、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空间发展权的分配、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资源空间的现代化追求的是实现空间资源的公平配置、绿色可持续、文化赓续与集约高效。这两个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载体的现代化能够提升空间资源价值;反之,对空间资源的过度无序开发或者空间资源错配则会破坏载体空间的完整性与安全性。中国式空间现代化的理想状态,正是实现二者在高水平上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共进。

2.载体空间维度视角下的空间现代化分析

安全韧性是空间系统的存续底线。一个现代化的空间载体,必须具备应对内外冲击的韧性与保障基本安全的能力。一是国土安全格局是中国式空间现代化安全的核心,必须构建坚实有力的国防和边防空间体系,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筑牢空间安全屏障。二是防灾减灾是空间安全的重要支撑,针对地震、洪涝、地质等自然灾害,通过划定危险区、建设防护设施、布局应急避难场所和救援通道,提升空间的设防水平。例如,在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流域推进河道治理与堤防加固工程,是保障流域城乡载体安全的关键举措。三是确保公共卫生安全,新冠疫情凸显了城市载体空间在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的脆弱性。需合理布局“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在应急状态下能快速转换为隔离、救治、物资储备空间,形成弹性可变的载体功能。四是运行安全是空间稳定运转的基础,需保障水、电、气、交通、通信等城市生命线系统稳定。构建多路径、有弹性的供应网络,减少单一节点依赖,运用技术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及时排查隐患,提升系统抗干扰与快速恢复能力。

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空间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载体空间的现代化要求打破分割、促进融合,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一是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习近平,2019)。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主体功能清晰、经济联系紧密的载体空间结构。二是城乡融合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

构,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重点是强化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城市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集约高效是空间利用质量提升的路径和方向,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必须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提升,追求空间利用的高效能。一是实施紧凑城市与精明增长战略,倡导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促进土地混合使用,提高城市密度,减少通勤距离与能源消耗。严格控制城镇开发边界,倒逼存量空间的优化提质。彼得·卡尔索普提出的“新城市主义”理论,强调以公共交通为核心的紧凑布局对提升空间利用效率和人居环境的重要意义(Calthorpe, 1993)。二是加快基础设施效能提升,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智能电网和新型能源系统,构建现代化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加快第五代、第六代移动通信(5G、6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载体空间的运行效率和智慧化水平。三是推进城市更新与存量盘活,利用粗放的空间对建成区内功能滞后区域进行系统性的改造、提升和活化,使之重新融入现代城市功能体系。深圳的“工改工”(旧工业区升级改造)和“城市双修”(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是这方面的积极探索。

3.资源空间维度视角下的空间现代化分析

公平配置是空间正义的核心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要求空间资源的分配必须体现公平性,保障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发展权。一是加强区域公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对口支援等机制,调节因自然禀赋、区位条件差异导致的“资源诅咒”或“发展洼地”问题,确保各地区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例如,中央财政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是实现区域间空间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二是加强群体公平,在城市化进程中,要保障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权益,防止对弱势群体的“空间剥夺”。在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上,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形成空间上的“贫民窟”与“富人区”对立。南希·弗

雷泽(Nancy Fraser)的“空间正义”理论强调,空间资源的分配公平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理解群体间空间公平提供了理论支撑(Nancy, 1997)。

绿色可持续是空间资源永续利用的生态基石。新质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空间上也一样,必须将生态环境本身视为最宝贵的空间资源,其保护与利用必须以可持续为准则。一是严格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生态敏感脆弱区域严格保护起来,禁止或限制开发活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严禁在红线范围内开展破坏生态的开发活动,严格限制可能影响生态功能的各类建设行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二是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与有偿使用制度是规范资源利用的重要保障,需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归属,建立权责明确的权利清单体系。同时,完善资源有偿使用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各类主体合理开发、高效利用自然资源,避免资源浪费与生态破坏,实现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良性循环。三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关键路径,探索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例如,开展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发展林业碳汇交易,开发生态旅游、康养产业,让保护良好的绿水青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强调生态承载力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为空间资源的绿色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Daly, 1991)。

文化赓续是空间灵魂的精神塑造。空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其现代化绝非割裂传统,而是要在创新中传承。一是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立系统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工业遗产等。保护工作应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性、活态化保护,维持其所在区域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生态。二是加快推进城乡风貌特色塑造,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城市设计、乡村风貌引导,提取和运用地方文化元素,拒绝“抄袭式”“山寨式”建设,营造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城乡风貌,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出的城市空间认知五要素(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为塑造具有文化特色的城乡空间提供了方法论指导(Lynch, 1960)。

集约高效是资源效能的极致追求。与载体空间的集约高效相呼应,资源空间维度更强调从产权、制度和管理上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一是加快“亩均论英雄”改革。“亩均论英雄”改革是推动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关键举措,核心是建立以单位用地税收、产值、能耗、排放等指标为核心的综合评价导向机制。通过量化评估土地利用效益,打破传统“重规模、轻效益”的用地模式,引导各类资源向亩均产出高、能耗排放低的优质产业和项目集中。同时,配套差异化的要素配置政策,对高效用地主体给予支持,对低效用地进行倒逼整改,推动土地资源从“粗放利用”向“精耕细作”转变,最大化释放土地产出潜力。二是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其核心是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安排与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成效直接挂钩。通过建立刚性约束机制,倒逼地方政府加大批而未供、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加快闲置厂房、低效用地的清理盘活与再开发利用。它既有效遏制新增用地盲目扩张,又能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实现土地供应从“增量依赖”向“存量挖潜”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土地资源保障。

四、“载体—资源”双维视角下中国空间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载体空间”关注空间的物理形态、功能结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支撑体系,强调其基础承载与服务功能;“资源空间”聚焦空间本身的稀缺性、价值性、可配置性与承载力,强调其战略性配置与效能提升。基于对空间现代化理论谱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耦合性的分析,本节论述双维视角下中国空间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1. 载体空间维度中国空间现代化的问题

一是空间结构失衡,协调发展任重道远。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地区间发展差距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从东西部地区来看,尽管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持续推进,但发展绝对差距仍呈扩大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东西部地区GDP差距为19.63万亿元,到2023年已扩大到38.28万亿元,10年间近乎翻了一倍,人均GDP差距也由2013年的2.78万元扩大到2023年的4.47万元。南北方经济增速分化现象凸显,北方地区在经

济总量、创新能力、营商环境等方面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引起广泛关注(魏后凯等,2020)。更为突出的是,人口、产业等优质资源持续向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过度集聚,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能级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13年的17037元扩大到2023年的30130元。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破除,城乡间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构成当前最大的社会结构性差距之一。农村交通、供水供电、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完善度、通达性上远不及城市,部分偏远乡村还存在设施老化问题;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农村优质资源短缺、服务水平偏低。同时,“要素下乡”面临多重体制机制障碍,土地、资本、人才等关键要素持续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人才流失、资金短缺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乡村振兴推进与城乡深度融合发展。

二是基础设施网络不完善,综合效能待提升,“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突出。尽管我国国家骨干交通网已日趋完善,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干线网络实现广泛覆盖,为跨区域互联互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最后一公里”梗阻问题仍未完全破解。在部分区域内部、城市群通勤圈以及城乡接合部、广大农村地区,交通、物流、信息等末梢网络的覆盖广度与连接效率仍存在明显短板。农村地区的村内道路硬化率不足、窄路会车难等问题依然存在,物流配送面临“进村入户”成本高、效率低的困境,生鲜农产品上行和工业消费品下行通道不够畅通。这些短板不仅影响群众出行与生活便利,更制约了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成为阻碍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瓶颈。

城市设施系统韧性不足。许多城市地下管网因铺设年代久远普遍存在老化、腐蚀问题,部分管网布局混乱且维修改造难度大;防洪排涝设施建设滞后,排涝标准偏低、调蓄能力不足,面对极端降雨等灾害时易引发城市内涝。同时,水、电、气、交通、通信等城市生命线系统缺乏足够的冗余备份,多依赖单一供应路径与设施,应急保障机制不完善,一旦遭遇设施故障或突发灾害,易出现运行中断,存在

显著安全风险,影响城市正常运转与居民生活保障。

三是“城市病”问题突出,承载能力面临考验。“大城市病”问题突出,部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面临交通、住房、环境、公共服务等多重系统性压力。高峰时段主干道路网拥堵常态化,轨道交通负荷持续攀升,通勤效率偏低;核心区域房价高企,刚需群体购房压力大,租赁市场供需失衡;工业排放、机动车尾气等导致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脆弱,部分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但供给有限,学位紧张、就医排队等现象普遍,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建成环境品质不高,城市空间规划缺乏人性化设计理念。公共开放空间供给不足,公园、广场等休闲场所分布不均且功能单一;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系统不连续、设施简陋,通行安全性与舒适性欠佳;城市建设中盲目追求现代化风貌,忽视历史文脉传承,部分历史街区肌理被破坏,传统建筑遭拆改,导致城市空间千篇一律,缺乏地域特色与人文温度,居民的空间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渐降低。

2.资源空间维度中国空间现代化的问题

一是资源配置不公,空间正义受到挑战。公共服务空间分异明显。优质教育、医疗等核心公共资源在空间布局上呈现显著集聚特征,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及核心城区,形成明显的空间供给失衡。这种格局直接导致“学区房”价格畸高,教育资源争夺白热化,跨区域就医潮常态化,不仅增加了家庭生活成本,更加剧了社会焦虑与阶层固化风险。偏远城区、县域及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薄弱、服务水平偏低,居民难以公平享有优质公共服务,进一步放大了空间不平等,对空间正义构成严峻挑战。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矛盾问题突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征地过程中,农民群体的土地财产权益保障机制仍不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与土地市场化价值存在差距,部分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彰显,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时有发生。同时,城市更新进程中“绅士化”现象凸显,部分历史街区、老旧小区改造后,房价与生活成本大幅上涨,低收入租户因经济压力被迫外迁,被边缘化于城市发展成果之外,加剧了社会空间分化与利益分配矛盾。

二是资源利用粗放,可持续发展承压。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不高。我国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

体处于中低水平,大量开发区、工业园区存在土地闲置、低效利用等突出问题,部分项目占地面积大、投资强度低、产出效益差,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规模增长过快,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已处于较高水平(刘守英等,2018)。这种粗放扩张模式与我国土地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相悖,既挤压生态与农业空间,也加剧区域用地供需失衡,制约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态空间仍面临被挤压的风险。在经济发展冲动的驱动下,部分地区忽视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管控要求,违规侵占生态空间、耕地资源的现象仍未杜绝。一些区域不顾环境承载力限制,过度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资源开发强度持续加大,已逼近或超过生态阈值,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与土地沙化等问题突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面临巨大压力,严重威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三是文化特色危机,历史文脉传承受阻。传统文化在城市快速建设发展中被淡化。在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过程中,“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较为普遍,大量承载城市集体记忆、蕴含地域文化特色的历史街区、传统建筑被盲目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缺乏灵魂的仿古街区,既破坏了城市历史肌理与空间格局,又丧失了独特的文化标识。这种建设性破坏导致“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特色危机日益凸显,城市空间失去人文温度与文化底蕴,难以承载居民的情感寄托。

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矛盾仍然突出。当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性投入普遍不足,资金短缺、技术支撑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存在明显短板,部分地区要么活化方式单一,仅局限于观光游览;要么过度商业化开发,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历史建筑原真性受损、文化内涵被稀释,其核心文化价值难以得到有效彰显,历史文脉传承面临“保护无力、利用失度”的双重困境。

四是空间治理体系碎片化,制约整体效能。不同层级和专项规划的衔接与协同仍需加强。尽管我国已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空间开发保护提供了基本遵循,但在实施层面仍存在规划协调不畅的问题。不同层级规划之间衔接不够紧密,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的指导约束

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各专项规划如交通、生态、产业等缺乏有效协同,往往各自为战,导致空间布局冲突、资源配置低效,难以形成“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规划实施合力,影响了空间开发保护的整体成效。

部门壁垒与“数据孤岛”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空间管理领域,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水利等相关部门存在职责交叉、权责不清的问题,形成明显的部门壁垒。各部门往往基于自身职能开展工作,缺乏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同时,由于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渠道不畅通,导致“数据孤岛”现象突出,空间信息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利用。这不仅造成管理效率低下、行政成本增加,更引发政策相互掣肘、监管缺位错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空间治理的整体效能。

五、优化中国式空间现代化路径举措

以系统思维推动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在于实现“载体空间”优化升级与“资源空间”高效配置的协同发力。

1.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深入推进实施“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性作用,统筹协调各类空间性规划,确保“三区三线”落地生根,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建立健全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统一规划技术标准与数据平台,打破不同层级、不同专项规划间的衔接壁垒。以刚性约束保障空间布局的科学性与连续性,避免盲目开发、重复建设,推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高效统筹,为中国式空间现代化筑牢规划引领根基,实现空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高质量发展。

稳步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为基础,结合主体功能区战略定位,精准制定并动态优化区域发展政策。对优化开发区域,聚焦创新驱动转型与发展品质提升,加大科技创新资源投入,推动产业高端化、服务精细化,严控增量用地规模,着力盘活存量空间;对重点开发区域,强化产业集聚平台建设与基础设施配套,提升人口吸纳承载力,引导优质要素合理集聚,培育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对生态功能区,坚守生态保护优先底线,严控开发强度与产业准入,加大生态补

偿与转移支付力度,聚焦民生改善与绿色产业培育,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协同发展。

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构建从国家到省、市、县、乡、镇的五级联动传导体系,明确各级规划的核心管控指标、刚性约束要求与弹性引导内容,确保上位规划的战略意图、空间布局与管控要求精准传递至下位规划及具体建设项目。建立规划指标分解、空间布局衔接、管控要求落实的闭环机制,强化上下级规划的衔接审核与动态监督,同步完善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破解规划实施中的条块分割问题,确保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整体性与连续性,推动空间发展目标从规划蓝图高效转化为现实成效。

2.推动科技创新,赋能智慧空间治理

建设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充分整合遥感、GIS、建筑信息模型(BIM)、城市信息模型(CIM)等先进技术,构建全国统一、覆盖全域的三维实景化信息平台,全面汇聚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审批、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各类数据资源。通过建立标准化数据共享与交换机制,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空间规划编制、项目审批、开发监管、执法督察的全流程数字化流转与智慧化管控,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实时、精准、全面的数据支撑,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高效性。

大力发展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深度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搭建城市运行管理智慧平台,对交通流、能源流、信息流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调度,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城市交通疏导、应急响应、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智能化水平。同时,大力推广智能建造技术,推动建筑工业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采用装配式建筑、智能施工设备与信息化管理系统,降低施工能耗与污染,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水平和建设效率,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构建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整合多源监测数据,建立覆盖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生态修复等全领域的动态监测网络,实时跟踪规划实施进度与空间利用变化情况。同时,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模型,对超载区域及时发出预警提示,定期开展规划实施成效评估,形成“监测—评估—预警—调整”的闭环管理机制,为规划动态优化、精准治理提供科学依

据,确保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始终在规划框架内有序推进。

3.深化制度改革,健全空间治理体制机制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原则,科学界定土地、矿产、森林、水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明确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内容与边界。建立全国统一、高效便捷的确权登记系统,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产权信息的精准录入、动态更新与公开查询,完善产权纠纷调处机制,强化产权保护执法力度,确保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为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市场化配置与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加快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及重要生态功能区,全面建立覆盖生态保护成本、兼顾生态产品价值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明确补偿标准、核算方法与支付方式,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地区协同守护生态环境。同时,积极探索市场化补偿路径,培育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发展林业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等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体系,让生态保护者获得合理回报。

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规范宅基地确权登记、流转、退出等机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同时,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积极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划管控、增值收益分配、用途管制等配套制度,畅通城乡土地要素流动渠道。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反映土地稀缺程度与生态环境成本;建立健全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激励机制,通过税费减免、指标奖励等政策,引导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积极处置闲置土地、低效用地,提升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水平。

加快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着力打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交通等部门间的管理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国土空间治理协同议事与联动执法机制,同步搭建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规划编制、项目审批、监管执法等数据的互联互通。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完善公众参与渠道,通过听证会、公示公告、网络问政等方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空间

规划、生态保护、城市更新等工作,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权责明晰、高效运转的空间治理新格局。

4. 坚定文化自信,塑造特色空间风貌

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立足城乡发展实际,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系统性框架,明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街区、传统建筑、工业遗产、农业遗迹等各类保护对象,细化分级保护要求与管控标准。同时,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强化技术支撑与人才培养,建立“保护—利用—传承”良性机制,避免建设性破坏与过度商业化开发,推动历史文化资源在活态传承中融入现代生活,增强城乡文化认同感与可持续发展动力。

加强城市设计与乡村风貌引导。将城市设计全面融入规划实施全过程,以人性化、精细化设计理念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天际线、街道界面,统筹建筑布局、色彩格调与公共空间打造,避免千城一面。针对乡村地区,强化建筑风貌分类引导,结合地域自然禀赋、民俗文化与生产生活需求,规范农房建设标准与风貌样式,推广传统营造技艺与现代建造技术融合应用,既体现乡土特色、民族风情,又融入时代审美与功能需求,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空间风貌。

推广“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在城乡建设中摒弃大拆大建模式,坚持渐进式、小尺度、低成本的更新路径,聚焦老旧小区、历史街区、乡村聚落等重点区域,精准补足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服务配置、改善人居环境质量。通过修复街巷肌理、整治建筑风貌、新增口袋公园、完善便民设施等细微举措,在最小干预前提下提升空间使用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记忆与生活气息,让城乡更新既贴合群众实际需求,又实现历史文脉延续与环境品质提升的有机统一。

六、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其对空间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全面也更深刻的要求。本文通过构建“载体空间—资源空间”的双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空间现代化的丰富内涵。研究表明,空间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既要建设一个安全韧

性、协调均衡、集约高效的现代化空间载体,又要实现空间资源的公平配置、绿色可持续、文化赓续与集约高效。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当前,我国的空间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在双维视角下存在一系列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进行顶层设计和路径创新。未来,应以落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治理为驱动,以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灵魂,统筹推进“载体空间”的优化升级与“资源空间”的现代化配置。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国的国土空间真正建设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与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高质量载体与宝贵资源,走出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空间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Blackwell, 1991: 26.
- [3] HARVEY D.The Limits to Capital [M].London: Verso, 2006.
- [4] SOJA E W.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M].Oxford: Blackwell, 1996.
- [5] CASTELLS M.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Oxford: Blackwell, 1996.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7] 水利部.“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Z].2021.
-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积极稳步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Z].2023.
- [9] 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求是,2019(24).
-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Z].2021.
- [11] CALTHORPE P.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M]. Princeton: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3.
-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Z].2021.

- [13]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Z].2020.
- [14]财政部.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Z].2022.
- [15]NANCY FRASER.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 socialist” Condition[M].New York:Routledge, 1997.
- [1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Z].2019.
- [1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Z].2021.
- [18]Daly H E.Steady-State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with New Essays [M].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1.
- [1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Z].2021.
- [20]LYNCH K.The Image of the City [M].Cambridge: MIT Press, 1960.
- [21]自然资源部.关于2022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Z].2022.
- [22]魏后凯,年猛.“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0(7).
- [23]刘守英,熊雪锋.中国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特征、问题与改革[J].国际经济评论,2018(4).
- [2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Z].2019.
- [25]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的通知[Z].2019.
- [2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Z].2021.

Space Moderniz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ic Demands and Path Optimization

Sun Jiuwen Wu Dianting Zhao Xijun

Abstract: Space is the venue and foundation for all human activities, and it is also a valuable comprehensive resource. In the grand narrative and uniqu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patial modernization goes beyond mere physical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and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concerning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By constructing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carrier space” and “resource spa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inherent stipulation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n spatial development. By tracing the theoretical spectrum of spati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rinsic coupling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basic demand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arrier space” and “resource space”, and on this basis,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spatial development from these dual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at the optimization of top-level design led by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the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drive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guaranteed by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shaping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cultural confidence will b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Chinese-style spati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patial Modernization; Carrier Space; Resource Space

(责任编辑:江夏)